

(豫) LJ201007 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濮阳党史

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主办

2024 第3期 (总第88期)



要闻速览



7月1日，中原油田在东濮凹陷近洼自生自储油气藏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形成千万吨级别储量的油气资源开发区域。



7月11日，首届郑和文化艺术节暨南京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开幕，濮阳市豫龙麦秆画在入选“郑和好礼”。



8月9日晚上，2024濮阳杂技文化旅游季暨第8版《水秀·龙之秀》剧目启幕仪式举行。



8月21日，中国共产党濮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9月13日，全省首本农村土地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颁发仪式在濮阳市南乐县举行。



9月26日，2024拳击世界杯比赛结束。濮阳运动员李书在66公斤级比赛中获得冠军。

卷首语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理解它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

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要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继往开来，奋发进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都是在完成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未竟的事业，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时不我待，催人奋进。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聚合亿万人民磅礴伟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团结奋斗，不断谱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壮丽篇章，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存史 资政 育人

濮阳党史

2024 年第 3 期

(期 / 季 总第 88 期)

编辑部

主 编：齐向前

副 主 编：张宗相

执行主编：唐利平

程 蕾

封面图片：

黄河月亮湾（台前） 高辉

封底图片：

戚城遗址



《濮阳党史》有声书



“濮阳党史”微信公众号

目录

卷首语

- 1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要文要论

- 4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曲青山

研究集萃

- 6 论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余登来
- 15 对范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反思
苏东升 赵瑞华

红色记忆

- 22 邓小平在濮阳
张宗相

25 濮阳地区干部南下新解放区述略

王自伟

31 南乐“武联防”的故事（二）

杜怀恩

历史风物

37 朱冠的为官之道

周进鹏

志鉴研学

40 浅议年鉴资料收集整理的范围、方法与要求
——以《濮阳年鉴》为例

程瑞敏

奋进历程

45 2024 年 7 ~ 9 月中共濮阳市历史大事记

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主 办：

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
研究室

地 址：

濮阳市人民路 158 号
市委办公楼五楼 507 室

电 话：0393-4426890

邮 编：457000

电子信箱：pydsyjs@163.com

发送范围：

省主管部门、市四大班子领导、
各县（区）、市直各单位、省辖
市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部
门、驻濮高校

准印证号：

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
（豫）LJ201007 号

印 刷：安阳长顺印务

印刷时间：2024 年 9 月

濮阳党史网：

<http://www.pydsfz.com>



“濮阳党史方志”抖音公众号



“濮阳党史”微信视频号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 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曲青山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他将自己的一生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党和人民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曾用凝练朴实的话语，讲到自己的革命生涯。这里我着重围绕邓小平同志讲过的两句话，阐释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品格风范。这两句话就是“跟着走”、“合格”。

“跟着走”，是邓小平同志对参加长征革命经历的回顾。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惊天动地的伟大远征，是党和红军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以非凡的智慧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写就光辉的壮丽史诗。邓小平同志是在中央苏区遭受人生第一次政治磨难后，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的。长征途中，他坚持办好《红星》报鼓舞部队士气，亲历遵义会议，在军事斗争一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几十年后，当

被问及在长征中做了什么时，邓小平同志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浓缩为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长征中，凭借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心，邓小平同志渡急流、过草地，和战士们手拉手爬过大雪山。他后来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跟着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紧跟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革命立场。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同志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同志处理中央事务。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他始终坚决拥护。他后来总结：“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跟着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邓小平同志常说：“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长征开始时，他受第一次政治磨难影响，没有担任军事职务。

但这没有消磨他的革命意志，他始终坚定跟党走，坚决不掉队，最终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一步步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合格”，是邓小平同志对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自我评价。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整个解放战争，自始至终，刘邓大军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邓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同志密切配合，率部逐鹿中原、决战淮海、横渡长江、挥师西南，圆满完成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几十年后，对这一光辉业绩，邓小平同志仅用两个字评价：“合格。”

“合格”，就是在危难关头勇挑重担、勇往直前。邓小平同志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下决心不要后方，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合格”，就是任何时候都严守纪律、遵从规矩。邓小平同志从全局的高度看待纪律和规矩问题，强调“把千军万马置于党中央视线之下”。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他始终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亲自向中央写书面报告，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和称赞。“合格”，就是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邓小平同志从来不搞小圈子，认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是



淮海战役时的邓小平（中）和粟裕（左）、刘伯承（右）
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他以实际行动树立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典范。

今天，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从邓小平同志说的“跟着走”、“合格”这两句话中，我们仍然可以收获攻坚克难的智慧和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原载于《人民日报》2024年8月25日第5版）

编者按：近期，我室对原市委党史研究室自 1984 年以来积存的各类文献资料、档案进行了全面整理，并集全室之力对保存价值较大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存档。根据编辑工作需要，自本期开始特设“研究集萃”专栏，选登早期党史和地方志研究方面的优秀文章，以飨读者。

论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余登来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研究，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实事

求是原则，坚持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为党史研究确立了正确指导思想、明确了科学研究方法，让党史的本来面貌得以客观生动地呈现。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最生动、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邓小平十分重视党史研究工作，告诫大家“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①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历史观现实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对于激励引导我们深刻认识和了解党的历史，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4 页。

一、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忠于历史，忠于史实，是这门学科的基本要求。但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或篡改史实，故意神化领袖，把领袖的个别思想言行绝对化，一切以领袖的言论作标准来判定党的路线、政策正确与否。这就完全践踏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也为党史研究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党史研究冲破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把立足点转移到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以领袖的个别言论作为判定党的路线、政策是非的标准转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上来，使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歪曲、篡改的党的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

在党史研究的方法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他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

一是对党的历史要有一个总体认识。他在对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谈到，写建国以后党的历史，需要“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①，这可

以使人们对党的历史有个全面的认识。“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②

二是要反映历史的主流。邓小平指出：“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公正的评价。”^③他说：“建国头七年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④总的看，我们建国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三是要作客观的分析。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⑤对于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过头。针对当时有人提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他指出，这两次会议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错误的，但组织上是合法的，“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⑥

四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⑦我们“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①

五是要善于总结，指导实践。邓小平说：“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②他认为总结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充分发挥了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作用。

（一）关于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问题

过去我党历史上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邓小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认为，有的够不上路线错误，有的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③把党内不同性质的问题，笼统归结为路线斗争，只能混淆矛盾性质，模糊历史真相。针对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对待，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正确区分党内斗争的不同性质，才能作出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公正结论。

邓小平还提出对党内矛盾和斗争一般不提路线斗争、路线错误。曾经，由于“突出路线斗争”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党内出现的问题、甚至不同的意见，往往习惯于从路线斗争高度去看问题。结果，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之类的称谓使用混乱，同时也窒息了党内民主生活。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就是“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④今后“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⑤当然，不提路线斗争，不等于不能用路线两字，只要使用正确，仍然可以用。而且“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⑥这就为弄清党内是非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评价

邓小平于1981年指出：“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⑦这是正确评价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这十年里，我党在各个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方面都在探索，呈现了发展中的曲折性，正确与错误、成就与挫折相互交替的复杂情况。正确评价与认识这十年，的确有一定难度。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的唯物主义态度，在对十年的各个阶段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通览全局，抓住主流，得出了准确客观的结论。

1957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自反右派斗争以来，“左”的错误思潮抬头，以致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正確思想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因此，邓小平指出：“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①但总的看来，1957年是应该肯定。

1958年到1960年批判反冒进的结果，使得“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小平明确指出：“‘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这是比较大的错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大炼钢铁，再加上一系列具体的‘左’的做法，结果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②因而，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违背了客观规律。

1961到1966年，在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

“八字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很快获得了恢复与发展。邓小平指出：“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③他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④但应该看到，这时的调整仍是一种被迫的调整，不是清醒的调整。“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⑤

综观“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诚如邓小平所评价：“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⑥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⑦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特殊阶段。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是关系到恢复党的历史面貌，正确总结历史经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创历史新局面大问题。因此，邓小平提出在起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总体设计和安排上，将“文化大革命”单列为一段，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论述。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邓小平对主客观条件作了全面的分析。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考虑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断斗争。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他“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产生的开端，“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①。在困难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把一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措施，当作了资本主义复辟进行批判。到1962年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②。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因此，“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

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③，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集体。因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④。从客观原因看，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从中国共产党本身说来，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连续性的胜利，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思想准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认识，缺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等。正如邓小平所说：“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⑤。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与我国的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邓小平指出：“他（毛泽东同志）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后果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作用进行了客观分析。他首先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①

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第一，在思想上造成了大混乱，留下了很深的毒害。邓小平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教师失掉了信任”。^②“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③第二，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三五”“四五”计划主要指标都得以完成，科技战线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内乱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邓小平多次强调，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1958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

像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就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第三，党风、社会风气受到很大损害。“‘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④第四，党的威信也大大下降了。因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直接导致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过去，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现在却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⑤总之，“‘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⑥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作用问题，邓小平指出：“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⑦，主要就是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和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初期，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就是一种抵制。1967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年2月，老师们正气凛然地抗争，是党中央内部出现的第一场公开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因此，邓小平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①1972年至1973年周恩来提出批判“左”的思潮，这是进行纠正“左”的错误的重大措施。1975年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这是纠“左”和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至于人民群众，正如邓小平所说：“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②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这些都是党的领导作用的表现。如“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③正是由于这些健康因素的存在，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澄清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利益所

在，而且也是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邓小平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高度的求实精神，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为我党、我国人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作出了新的卓越贡献。

（一）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

首先，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在我党历史上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封建意识等影响，曾经在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上，存在着对领袖神化的现象，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鼓吹现代迷信，大搞“造神运动”，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在群众中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把神化领袖的个人崇拜现象推向了顶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党内一些领导同志仍然坚持“两个凡是”思想，邓小平坚决批判和否定了这些错误的倾向。他明确指出：领袖是人，不是神。把领袖看成没有缺点、错误的“神”，是不符合领袖本身的实际情况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问题。”^④邓小平反对对领袖神化的论断，对破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制造的精神枷锁，促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提供了思想条件。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有力地冲破了把领袖神化的堤坝，增强了人们实事求是的思考能力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和辨别能力。正是这一契机，为党的工作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随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深入开展，对“左”倾错误思想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对刘少奇问题平反昭雪后，一些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又产生了对毛泽东同志错误估计过重、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现象。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重新提了出来，如稍有偏差就会引起混乱，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很大影响。邓小平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从稳定局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前途根本大局考虑，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明确表示：“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①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阐述。

一是客观公正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突出表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再者，毛泽东同志晚年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思想，例如，“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他接触实际少了”^②分析指出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严重的，既客观，又恰如其分。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犯同志错误的客观原因。他犯错误也与缺乏经验和制度不健全有关。邓小平指出：“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③

三是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他总结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一整套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学说，在各个领域中指导着中国人民进行正确的斗争；他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了党，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④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又和全党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②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不可磨灭的。

(二) 科学阐述毛泽东思想

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批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对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曲折的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正确的理论概括、集体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完整体系,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党的一些文件、决议中,绝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论断、片言只语,或某篇文章。“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③邓小平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

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④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打着“高举”的旗号,鼓吹“顶峰论”“摘警句”“走捷径”,断章取义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一种割裂科学体系,破坏精神实质,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的恶劣伎俩。早在60年代初,正当林彪推行以学习“老三篇”来代替学习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就和罗荣桓等一起,批评林彪的这种做法,指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由于流毒影响,割裂毛泽东思想的片面和实用主义倾向依然在各个领域中存在。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⑤

(本文选自2001年第2期《濮阳党史》。本次登载已经作者本人修改后发表。作者原系濮阳市市区党史研究人员,现任濮阳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对范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反思

苏东升 赵瑞华

1958年6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先后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山东等地。8月底，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化问题的决议》，9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总结范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教益。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阅读了关于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在万人大会上的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他还建议派人去调查了解情况。范县成了全国典型。1958年12月由周恩来总理题签颁发了国务院奖状：奖给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山东范县人民公社，农业出版社又出版了《一个老根据地的人民公社》一书。

“大跃进”时期，范县是山东省聊城地区西南边缘上的一个县份（1964年划归河南省安阳地区，1983年濮阳建市时划归濮阳）。当时，

“学寿张，赶范县”，是喊遍山东省的“跃进”口号，特别是自1958年秋，中央在西安九省（市）协作会上插了范县的红旗以后，全国来自黑龙江、内蒙、贵州、福建等近20个省（自治区）及本省各地、县的参观团体络绎不绝，不足一个月，即接待3万多人。

人民公社化的红旗

1958年11月18日《大众日报》以头版醒目标题刊登：范县111万亩耕地，每亩产粮食5067斤，每人占有粮食9000斤，是仅次于寿张县的全省第二面红旗县。

范县力争“以跃进的步伐迈进共产主义”，1958年8月26日晚在龙王庄成立了范县第一个人民公社；8月29日，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9月14日又将全县10个人民公社合并成一个大社——范县人民公社，并且制定了二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

1958年秋，范县三次发起全民大炼钢铁的“淮海战役”，有65030人的钢铁大军，其

中有 1500 多人战斗在鲁中南莱芜基地。县内建有各种土炼锅炉 5710 个。10 月 17 日至 24 日，一周炼铁 4700 吨。11 月 7 日，苦战一夜，放出日产钢 7492 吨的特号卫星。

1958 年 8 月初，全县第一个农民公共食堂在徐庄村成立。8 月中旬，全县实现了农民生活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11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又以大字标题刊登范县小学生《上学不要钱，食宿集体化》的消息，并发表了《小学生住校供给制好得很》的短评。

范县大力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 年 11 月 1 日，县委宣布：全县粮食高产卫星，亩产万斤以上到 5 万斤的 407 个；花生卫星，万斤以上到 5 万斤的有 60 个；棉花卫星，千斤以上到 7000 斤的有 10 个；地瓜卫星，产 10 万斤到 50 万斤的有 475 个。并以此说明“马列主义能够出粮食”。在大炼钢铁时，又提出“马列主义不但能够出粮食，而且能够出钢铁”。据此道理，范县县委制定的 1959 年小麦生产跃进计划是：每亩单产保证 1 万斤，力争 1.5 万斤。

人民公社化的历程

范县“大跃进”，自 1958 年春到 1960 年秋，历时 3 年之久。具体分析起来，这 3 年时间充满了矛盾斗争，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里程。

第一，自 1958 年春至该年冬，为“大跃进”的发动兴起阶段。范县“大跃进”是在 1957 年党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1958 年 1 月 7 日，范县四级干部大会在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鸣放辩论和大批右倾保守思想、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尾巴主义的基础上，通过了 10 个农业发展规划，要求“今年过黄河，明年过长江，三年达到千斤县”，当年粮食生产，要在 1957 年每亩单产 215 斤的基础上，达到亩产 600 斤。这个计划的墨迹未干，县委又在 2 月 28 日对 1958 年农业生产计划作了修改，要求亩产粮食 800 斤，争取 1000 斤。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全国推向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新华社 7 月 11 日有消息说：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 2 亩小麦丰产试验田南产 7320 斤。范县紧追不舍，宣称全县最高的小麦丰产王是登峰社的 5 亩试验田，亩产小麦 2013 斤。全县小麦比 1957 年增加了 62%，打响了“跃进”的第一炮。

7 月下旬以后，范县县委本来已经发热的头脑开始发涨。他们发誓要超过刘少奇主席视察过的寿张县（与范县毗邻），大搞“卫屋上天，元帅升帐”，遂将 1958 年计划指标又提高到“亩产千斤粮，双万斤地瓜，双百斤皮棉”，特别是在 8 月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形成了“以钢为纲”，各行各业的全局性“左倾错误”，由原来单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发展为“共产风”“浮夸风”“革命风”“特殊风”“瞎指挥风”五毒俱全的大型恶作剧。第一幕“共产风”，化私为公，化集体为全民，把全县群

众搞得晕头转向。全县农村以管理区为单位划为工业区、文化区、福利区，并拆墙扒屋，“四通八达”，社员大搬家，青壮年劳力分别集体住宿，在一系列的大办中，全县共平调社员劳动日 720 万个，土地 10.2417 万亩，粮食 229 万条斤，大牲畜 1164 头，拆毁房屋 5.218 万间，还有车辆、砖瓦、木料、猪、羊及锅碗瓢勺等无所不有，甚至连社员的外汇款也到不了自己手里。全县“一平二调三收款”共折合人民币 3700 万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 59 元。

范县又是全省乃至全国大搞浮夸风县份之一。9 月中旬，通过对早秋作物的“查棵、量穗、推算、试打”等手段，宣布全县谷子亩产 5291 斤，春玉米亩产 5133 斤，均比上年增产 20 多倍。晚秋收获后，县委听说寿张县亩产 5076 斤，于是便开会统一口径为：范县粮食亩产 5067 斤，屈属全省第二名。为了迎接参观检查，竟然弄虚作假，古云集虚设假仓库 3 座，濮城镇将几个生产队的大块地瓜集中在一起，堆成“地瓜山”，还将不同地块的大棵玉米，灌水移栽在靠近参观路线的“丰产田”里。参观人员来时，各食堂吃好饭，并将几里远的社员都调到公路沿线干活、喊口号，还在公路旁披红挂绿、扎牌坊，用掉绸缎布匹 3 万余尺。

范县“命令风”也很严重。全县设立了生产跃进指挥部，下辖十个野战兵团，各兵团以下按营、连、排编制，实行“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命令如山倒，作战大兵团。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已发展成为违法乱纪，强迫社员劳动。为了显示群众的劳动干劲甚至命女

社员扒掉上衣干活，在此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干部特殊风及指挥风已可想而知，不再赘述。

第二，从 1958 年底至 1959 年秋，是“大跃进”的第二阶段，即初步刹风和着手纠正“五风”错误的阶段。1958 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工作中产生的错误，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公社体制与分配方面后退调整，并逐步压缩空气，使之接近于农民所能接受的程度。范县于 1959 年 1 月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整社工作。1959 年春，中央政治局郑州扩大会议后，由一县一社恢复为全县 10 个人民公社，初步贯彻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办社方针。核算单位由大变小，4 月初改为基本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236 个），4 月底调整为基本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954 个），直到 1961 年秋，总算把核算单位退到了生产小队这一级（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也是步步加深，4 月初开始兑现，结果“铁算盘”挡道，形成倒算帐。到 5 月中旬，才初步打开了局面，对“大伙食堂”也提出了改进意见，由“吃饭不要钱”改为“定工、定饭、旷工拿钱”。在生产管理上，推行了定额管理办法，实行包工包产（包到队）。所定生产指标，尽管还比较高，但逐渐向实际靠近。对 1958 年吹起来的粮食产量，逐步下降“核

实”，1959年1月下旬“核实”为亩产1800斤，到6月底又“核实”为313斤。这个时期已出现粮食紧张、生活困难的情况，上级调拨5000万斤粮食，才勉强安排下了生活。

第三，1959年秋至1960年冬，是发动一场新的更大跃进的阶段。1959年7月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向反右。9月23日，范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庐山会议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大批了“非难大跃进，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水利化，非难群众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右倾思想、右倾活动”，要各级党员干部“硬着头皮顶住，挺着胸膛赶上，逆流猛进，力争上游”。此后，便以“反透右倾，鼓足干劲，掀起更大更全面的跃进高潮”为行动的指南和口号。1960年2月12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撤起了“千、百、万大面积丰产运动”（即实现千斤粮、百斤皮棉，万斤大地瓜），并把运动开展得好坏提高到保卫“三大红旗”的高度来认识，不过，这次“大跃进”是在被迫一边抓生活，一边搞“跃进”的情况下进行，高产风、浮夸风已没有了市场，尽管指标还比较高，但比起1958年已是一落千丈。这次“大跃进”主要搞的是，大力发展社有经济，大办农场，大办水利，大搞丰产路、丰产方，大办集体养猪场等。在这些工作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共产风”，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县有13万口人的野战兵团大搞修渠、挖河，总投资670万元，其中上级拨款仅328万元，

其余全部是平调的。在大办水利和大办集体养猪场时，为凑集砖瓦、木料等，再次出现了拆房、扒墓和破井现象，不少地方春季兑现给社员的猪、羊又逮了回来。1959年冬，全县打破队界、社界，实行大兵团作战，搞了60万亩小麦丰产田，无偿调用各村的劳力和牲畜，在体制上又走了回头路，“穷过渡”有所抬头。1960年春季，又将全县1127个生产大队合并为948个。农民集体食堂本来到1959年冬已经解体，所剩寥寥无几，在大抓生活中，又根据毛泽东同志批转的贵州大办食堂的经验，到1960年4月底，全县又恢复建立食堂3145处，在食堂就餐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5%。县委在安排生活时脱离实际，认为基层干部有“下坠情绪”，大搞“反瞒产”，批评上报产较低的单位和领导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致使分配政策不能兑现。1960年夏季分配定产每亩134斤，而实际上只有71.5斤，全县完成4500万斤征购任务，再留2000万斤种子，每人只合口粮十来斤，后来把种子吃掉，口粮才合到34斤。

1960年10月31日，范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对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处分决定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初步揭开了范县大刮“五风”的盖子。1961年1月，县委又召开四级干部大会，第一次承认了范县“大不好”的形势；进一步清算了“五风”的错误，号召全县人民同心同德，战胜困难，扭转形势，为争取1961年农业丰收而奋斗。至此，历时三年的“大跃进”宣告结束。

人民公社化的后果

范县自然条件优越，地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历年来劳动人民辛苦劳作，生活虽不算富裕，但也能够自给自足，略有盈余。全国解放后，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粮食生产年年提高，从1952年至1958年，全县征购与统销相抵，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一千万斤左右，人民的生活，正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把他们引向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恶果，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在大办水利中，打破自然水系，破坏生态平衡，不但使全县土地减少40万亩，而且造成土地碱化20万亩，三年不上粪的“白茬地”占到总耕地的一半以上，荒草地成片发生，仅1960年夏秋即发生草荒50多万亩，成灾14万亩。到1960年全县粮食比1957年减少98%，牲畜饲养比“大跃进”前减少了3.2216万头，减少47%，毛猪减少49%，大车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均减少40%以上。生产队和社员家底多荡涤无存，无有国家扶持，已难于维持再生产。至于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挫伤，那更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达的。

第二，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不应有的严重困难，1958年范县本是一个好年景，但这一年丰产不丰收，由于第一线的劳力少，又不顾一切地强调“高速度”，造成秋收粗糙，不少地瓜、花生埋在地里，有的用犁子犁地瓜、

花生、萝卜。这年应收而未收到家和秋后霉烂掉了的粮食达5000多万斤。又加产量浮夸连续二年购了过头粮，群众反映“您报空，俺喝风”。从1960年夏收到1961年夏的一年中，全县每人的平均口粮只剩下189斤（分配加统销），每人每天半斤零三钱。因此，大搞副食品、瓜菜代，甚至一粒粮、一块薯、一个萝卜、一片菜叶都成为与群众生命攸关的问题。除吃饭问题外，群众住房、穿衣、烧柴、治病等问题也非常紧张。1960年冬，全县缺房和无住房的达3.4万户，15万人，共缺房5200间；缺少棉衣、棉被的有4.8万多户，10.1万人。因此，保人、保牲畜成了当时一件紧迫性的政治任务。据1960年10月31日县委报告称：从1958年秋，全县外流5.3877万人，两年死2.6785万人，发生水肿病4.74万人，干瘦病9300人，妇女子宫下垂、闭经等2.6412万人，因生活所迫，甚至出现有夫之妇改嫁和弃婴卖婴等现象。范县统计资料载：1960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负数，总人口比1957年还减少了近万人。

第三，使广大干部群众在精神上遭受到极大的创伤。在“大跃进”中，“辩论”是“斗争”的代名词，“不通就辩”是当时推动工作的主要领导方法。在1958年至1959年，全县被当做“白旗”拔掉和被胡乱撤职的干部达992人，占干部总数的5.2%，仅1959年秋，即拔“白旗”206人，在不少基层单位，甚至用筛、捆、打、冻、饿等手段草菅人命，全县有3000多群众被打，被打伤者有110多人，致死有30多人。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人民群众大都不敢讲真话、实话，互存戒心，否则就会以“右倾保守”“反对三面红旗”来处之。可见，在“大跃进”中，我党在政治上的损失也是很大的，它使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紧密联系群众三大作风遭到极大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威信和形象受到损伤。

总之，三年“大跃进”给范县人民带来的是一场严重灾难，“大跃进”过后，本来是一片生机盎然的范县，到处颓垣断壁，满目荒凉，大伤元气。

总结“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大跃进”中，由于人民群众焕发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地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比如，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修建了彭楼引黄灌溉工程，全县配套机井由1957年的10眼，发展到78眼，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8万多亩，1959年开挖的范莘干渠，至今还为莘县的水利灌溉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7年的12马力，发展到1960年的1954马力，另外创建小型机械、电力等地方工业，这些都为后来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人民公社化的教训

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不断检验，逐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年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人们冒犯不得的禁区。

60年代初期，开始纠正“大跃进”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以保卫“三面红旗”为前提的，只治标，不治本，“五风”显然受到遏制，但“左”倾错误时有泛滥。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段历史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但笔者认为，真正从思想理论上弄得通，还是从“十三大”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以后。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大跃进”这段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联系三年“大跃进”的实际，我们应从中接受什么教训呢？

第一，摒弃“一大二公”、“穷过渡”，牢记不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多、底子薄，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搞饭吃，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范县，当时有43万人，其中有42万人用体力劳动搞饭吃，全县农业总产值仅有1981万元，农业机械总动力12马力、机灌70亩；工业总产值353万元，只能产铁、木制家具、肥皂、植物油、草帽辫、砖瓦等。在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进而提出到1960年建成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这不更使人嗤笑于天下吗？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被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好的旧观念禁锢着，热衷于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

改变所有制形式，使国家和人民饱尝了苦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根据我们国家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在生产关系上作了重大调整，在农村率先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找到了适应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最好组织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笔者认为，这种责任制形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摒弃“高指标”“高速度”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当时，迅速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生产力怎样才能得到迅速发展？由于我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当时尚处于幼稚的、不自觉的阶段，急于求成，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得到急剧提高，结果造成严重失误。1958年范县腰斩金堤河，建造起“春景湖”“红旗湖”“跃进湖”，名噪一时，其主观愿望是要尽快实现水利化，把范县建成“鱼米之乡”。但这工程未经科学论证，早年干枯无水，涝年阻水成灾，给范县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祸患，不得不在1960年废掉。再如，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为实现“1070”而奋斗，范县根本没有炼钢的物质、技术条件，“砸锅卖铁”“小土群上马”，炼来炼去还是废铁一堆，并且顾此失彼，造成农业失收，为“保钢”连“民以食为天”也不顾了。这说明，欲速则不

达，要办成一件事情，首先要有科学态度，考查它的历史和现状，顺应客观规律，谨慎行事，切不可盲目追求高速度。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好像指标越高，干劲越大，这样，人们往往被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的迷惑，诸如1978年提出建设“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

第三，摒弃传统经济单一模式，克服平均主义，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过去，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干了不少蠢事。一直在限制、排斥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大跃进”中与“劳过渡”紧密相联，盲目追求单一公有制经济，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统统被取消或不起作用了。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以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生产力。

总之，“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犯的一次大错误。但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教育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原载于2001年第2期《濮阳党史》，作者为范县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退休干部。）

邓小平在濮阳

张宗相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党史研究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邓小平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革命风范，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坚定自信、厚植情怀，潜心治学、扎实工作。

濮阳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发祥地和中心区，邓小平同志战争年代曾在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战斗、工作，在濮阳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串串足迹。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向中国华北大量增兵，企图首先占领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最后完成对整个华北的占领。1937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1937 年 12 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分批挺进平汉路以东冀南地区，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击敌伪，建立政权。1939 年 4 月，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与前来检查工作的八路军副

总司令彭德怀在清丰县韩村集召开会议，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于光汉，秘书长郭森，救国总会负责人安法乾和清丰县委书记姚伟杰出席了会议。会上，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对冀南的情况作了汇报。邓小平同志就冀南区党委应如何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等工作的开展作了重要指示。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濮阳，与濮阳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濮阳，抗战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1944 年 9 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及军区司令部由观城红庙进驻清丰单拐村，书记为黄敬，司令员为宋任穷，领导着东到津浦，南跨陇海，西临平汉，北靠德石的广大地区，是联结华北、华中的战略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4 年 7 月，黄敬同志因病离职，由宋任穷同志代理书记一职。1944 年至 1945 年初，冀鲁豫分局带领根据地人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形势虽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特别是在民主民生斗争方面是一个薄弱环节，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冀鲁豫分局代理书记宋任穷于 1944 年 12 月向中央发电报请求支援，要求中央派“大员”到冀鲁豫加强领导。1945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

发电：“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去指导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工作作风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决定由邓小平率北方局机关到冀鲁豫分局指导工作，当时邓小平同志刚被选为七大代表，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去冀鲁豫比参加七大更为重要。1945年3月上旬，邓小平同志率北方局机关干部包括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太行三地委书记彭涛等，从山西左权县麻田镇出发，向冀鲁豫根据地进发，于3月中旬，进入冀鲁豫四分区驻地濮阳县，受到四分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一行先住在尚和县李家楼（今华龙区李家楼），3月下旬转移到清丰单拐。

到单拐后，邓小平顾不上休息，即与宋任穷等一起研究解决如何在不同地区普遍地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邓小平认为，要充分发动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首先要了解不同地区的群众运动中执行政策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然后统一干部的思想。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邓小平和宋任穷等研究决定，北方局干部分三个组到老区濮县、滑县和新区濮阳县三个县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调查组返回后，邓小平认真听取汇报，并与冀鲁豫分局负责同志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了不同地区运动发展的经验和问题，研究了一些具体政策。并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冀鲁豫区群众运动

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在不少问题上达成共识。

1945年6月6日，在调查研究和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邓小平总结了冀鲁豫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群众运动较好地解决了群众观念和相信群众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以贫农、雇农为运动核心和切实照顾贫农的方向；削弱了地主，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的气焰；教育了干部，培养了大批新的本地农民干部。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了当前群众运动中存在的弱点，提出党领导群众“要站在群众之中之前，而不要站在群众之上之外”。关于今后的群众工作，他指出：仍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将减租减息政策贯彻到底，注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防止脱离群众的倾向，从当地内外环境条件出发，从当地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教训出发，对不同地区、不同阶级和阶层，区别对待。边区群众工作会议后，冀鲁豫全区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民生运动，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繁忙景象，根据地获得空前巩固，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邓小平在清丰单拐工作时的居所

对敌斗争力量大大增强。

邓小平在单拐期间，遵照毛主席“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把一些守备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可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的指示，协同分局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先后进行了南乐、东平、阳谷等战役，扩大了冀鲁豫边区。1945年6月中旬，为了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邓小平返回太行山区转道去了延安。8月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乘坐美军观察组运输机离开延安返回冀鲁豫边区，继续指挥冀鲁豫军民对日反攻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全面进攻。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作战方针，为了配合苏皖解放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刘邓野战军从1946年8月开始，先后进行了陇海、定陶、鄆南、豫皖边等战役，共歼敌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的作战。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邓指挥下，进行的豫北、晋南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打破了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战略决策。1947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主席作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

1947年4月，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为跃进大别山准备强渡黄河，到范县调查，范县委书记宋望平、县长陈华锋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详细汇报了范县的气候、地

理、地形、群众思想觉悟，黄河的水势、深浅、宽窄、渡口、船只以及岸边的其他情况。邓小平这次在范县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制订强渡黄河的计划奠定了基础。

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在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的率领下，在濮阳县和东阿县之间强渡黄河，举行战略反攻，台前县孙口（原属寿张县）是大军渡河的中心渡口。当日上午，刘邓首长不顾征途疲劳和敌机轰炸，在黄河指挥部政委郭英、寿张县委书记杨村夫的陪同下，亲临孙口渡口视察，察看船坞和渡河器材，并和水手们亲切谈话，鼓励他们下定决心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渡河任务。6月30日夜，刘邓大军分别到达各渡口，在长达150多公里的河线上，采取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被国民党自诩为可当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邓小平在冀鲁豫边区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谱写冀鲁豫大地上，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冀鲁豫老区人民的心中。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发扬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濮阳地区干部南下新解放区述略

王自伟

南下干部，一个随着解放战争政治军事形势发展而产生的历史名词，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为支援全国解放，中共中央抽调大批北方干部冒着硝烟，抛家舍业，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新解放区，参加接管、巩固、建设新中国政权。濮阳地区作为冀鲁豫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西进，足迹踏遍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 8 省，跨黄河，渡长江，翻山越岭，行程 8000 余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保证党的战略决策的实现，为支援新解放区，

争取全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一、响应中央号召，组建南下队伍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九月会议”，会上提出，“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 5.3 万人左右。华北 1.7 万人。”10 月 29 日，华北局作出《关于外调 17000 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 5 个区党委，各配齐一个区党委架子。”

华北局分配冀鲁豫区党委抽调能够组成一个新区区党委所需要的干部任务，新区包括 6 个地委、30 个县委、210 个区委，共 3362 人。2 月 3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华北局除八千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体干部均应准备随林彪、罗荣桓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2 月 5 日，《冀鲁豫区党



中共直南地委欢送南下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合影

委就南下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已批准南下县委应立即宣布。各地委南下干部务于2月28日整队到菏泽晁八寨集中，以便整训学习。”冀鲁豫区党委分解到所属地委的抽调干部任务是：九地委组成1个地委机关干部框架的五分之四，以及4个县、28个区的干部框架，共437人；八地委组成1个地委机关的干部框架，以及4个县、35个区的干部框架，共521人。当时，范县、濮县、寿张（今台前县）、阳谷、朝城、观城县属九地委。昆吾、濮阳、清丰、卫河、南乐、内黄、尚和县属八地委领导。

为完成这次干部南下工作，从冀鲁豫区党委至地委、县委，层层组织发动，加强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加强对干部的组织管理，强调组织纪律性，克服乡土观念、地方观念。经过政治动员与组织准备之后，在干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公开动员，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带头报名，以自愿报名南下和服从组织调动相结合确定人选。濮阳地区共选派南下干部660余名，昆吾县批准了以孟周、丁英、路风楼、张新民等69名干部，另有交通员、炊事员、警卫员20余人，共90余人；清丰县、卫河县批准了以陈达之、王陞三、郭俊才为首的122人（清丰县92人，卫河县30人）；南乐县批准了以王涌波、石砺山为首的77人；濮阳县批准了以夏树屏、李冀础为首的126人；尚和县批准了以张悦斋、张经武为首的53人；范县批准了以丁福五、曹建平、张靖玉为首的60人；濮县批准了以陈少瑞、葛宝林为首的60人；寿张（今台前县）批准了以何进、王之典、陈

伯文为首的72人。

二、集结晁八寨，整风明纪

1949年3月1日，濮阳地区南下干部从濮阳县东关外出发，前往冀鲁豫区党委驻地菏泽，第二天到达菏泽城南晁八寨一带住下。在冀鲁豫区党委领导下，南下干部部队在晁八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干部支队。支队下辖6个大队，39个中队。冀鲁豫八地委和四地委以及七分区所抽调的干部合并，共计800余人，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第一大队，九地委和七地委编入南下支队第四大队，以县为单位设立中队。各县中队主要负责人分别是：一大队一中队（清丰县、卫河县）王陞三任队长，陈达之任政委；一大队二中队（濮阳县）李冀础任队长，夏树屏任政委；一大队五中队（南乐县）石砺山任队长，王涌波任政委；一大队六中队（尚和县、内黄县）张经武任队长，张悦斋任政委；一大队四中队（昆吾县）孟周任队长，丁英任政委；四大队范县中队丁福五任队长，张靖玉任政委；四大队濮县中队陈少瑞任队长，葛宝林任政委；四大队寿张县中队王之典任队长，何进任政委。3月5日，南下干部支队召开学习动员大会，鼓励大家随军南下，要求认真学习政策，同时介绍了全国的形势和外地接管城市开辟新区的工作经验。随后利用3周时间，支队全体成员早晨进行军事训练，如列队、防空袭、遭遇战、打背包、问口令、传口令、警戒方法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上午、下午学习中共中央制定的接管城市和开辟农村



中共寿张县委欢送南下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合影

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濮阳地区南下干部，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小组讨论等形式，对国内形势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了解，提高了执行新区政策的水平，加强了纪律性，坚定了随军南下的决心和胜利信心。3月26日，冀鲁豫区党委在晁八寨举行欢送全体南下干部大会。3月31日，濮阳地区干部同南下干部支队从菏泽晁八寨出发，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向江南进军。

三、接管赣东北，初展担当

南下干部支队步行经过定陶、曹县至商丘朱集火车站，再乘火车经砀山于4月3日到徐州火车站，即归华东局领导。自徐州转车熄灯前行，经宿县、蚌埠，于4月7日至合肥车站下车，作短暂休整。4月11日，南下干部支队从合肥出发，向皖南进发，步行过肥西、舒城，15日至桐城南驻下休整3天。4月18日，在徐运北主持下，中共赣东北委员会在桐城召开了由南下支队所属各大队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由一大队接管鄱阳地区。鄱阳地区下辖鄱阳、都昌、湖口、彭泽、余干、万

年县及鄱阳市，地委书记白潜，副书记常颂，军分区司令员周桂生，政委白潜。南下支队4月21日从桐城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原定的渡江地点急进，4月24日到达长江北岸安庆，支队全体分批奔赴渡江口岸，登上浮桥，队员拉着手、扯着衣服紧随其后，伴着浮桥不停地起伏摆动，小心翼翼迅速地渡过长江。鄱阳地委书记白潜率一大队从安庆渡江后

即赴鄱阳地区进行接管，进驻彭泽马当。在马当，白潜召集开会，宣布各中队任务，由一中队（清丰、卫河县）接管湖口县，二中队（濮阳县）接管都昌县，六中队（尚和、内黄县）接管鄱阳县，南乐县五中队与昆吾县四中队合并接管鄱阳市。

一中队（清丰、卫河县）4月27日进入湖口县境，4月28日进驻县城，湖口县委由书记陈达之、县长王陞三、宣传部长魏向远3人组成。

二中队（濮阳县）5月11日到达都昌县徐家埠，5月12日进驻县城，都昌县委由书记夏树屏、县长李冀础、组织部长刘杰、副县长张光涵4人组成。

六中队（尚和、内黄县）4月27日到达景德镇，4月29日到达鄱阳县机关驻地磨刀石，鄱阳县委由书记张悦斋、县长史可鉴、县委副书记尚子瑞3人组成。

南乐县五中队与昆吾县四中队奉命合并为一个中队，中队政委王涌波、中队长孟周，5月5日到达鄱阳市，原冀鲁豫八地委常委、专

署副专员陈桐源兼市长，王涌波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主持市委、市政府日常工作，王志超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兼二区区委书记，原五中队队长石砺山调离。

1949年4月底至8月，濮阳地区南下干部在赣东北区党委的领导下，相继在湖口县、鄱阳县、鄱阳市、都昌县建立人民政权，采取出布告、召开各类会议等多种形式，宣布人民政府的建立；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以安定人心；号召、组织工人复工，学校复课，商店开门营业，建立革命秩序；对国民党在各市、县、乡的政权机构、军事设施等，由人民政府和军事部门分别派员进行接管。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建政接管的同时，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征粮支前。当时处于青黄不接季节，加上国民党溃败前的大破坏，库粮匮乏。为了征集粮食，以保证军需民食，各县、区党政干部迅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克服了人生地不熟等困难，至8月底赣东北区共征借粮食2693万斤、马料514万斤，保证了军需，并将数百万斤大米调往上海。二是扩建地方武装，平息匪患。解放不久，我野战军持续推进，境内只有少数市、县、区干部和少量的地方武装，敌特势力逐步猖獗。为了平息匪患，以南下支队武装干部和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扩大地方武装开展剿匪。到8月底，赣东北全区剿匪作战174次，歼敌5176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三是抗洪救灾。6月初和7月底，鄱阳地区两次遭受水灾，冲毁土堤185处，被淹田土169万亩，灾民达50万人以上。灾情发生后，濮阳地区南下干部带领群众积极投入抢险斗争，

人民政府先后向灾区发放救济粮8万余斤、救灾款261万元，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四是开办训练班，培养选拔地方干部。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充实干部队伍，各市县分别开办知识青年训练班。经过学习和训练，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革命队伍，使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基本保证了工作的需要。通过这些工作，不仅为赣东北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打下了基础，而且使赣东北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进军的基地之一，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四、西进贵州，扎根大西南

1949年7月，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二野向西南进军，中央决定从冀鲁豫区南下至赣东北区工作的全体干部勤人员，组成西进支队，随五兵团向大西南进军，成立中共贵州省委，接管贵州。赣东北区交中共江西省委接收。8月13日，赣东北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赣东北区划归中共江西省委领导。8月20日，中共江西省委派出360名干部到上饶进行接收。9月初，濮阳地区南下干部全体工作人员到上饶集中学习，准备西进。9月4日，赣东北区党委在上饶召开全地区以上干部会议，徐运北同志对赣东北区4个月的工作进行总结。9月10日，赣东北区党委在上饶市广场召开由全体西进干部和勤杂人员参加的西进动员大会，宣布赣东北区党委行署、军区撤销，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支队正式成立，支队长傅家选，政治委员徐运北。动员大会之后，濮阳地区

南下干部以支部为单位，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大家对国内形势和向西南进军的意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认识到党中央决定向大西南进军，是解放全国人民的大局，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西进支队从上饶出发前，经组编，全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共有干部5771人，战士和勤杂人员3560人，共9331人。9月25日至28日，西进支队的全体成员从上饶出发踏上了西进贵州的征途。前梯队沿五兵团进军路线，从上饶乘火车至南昌，又乘汽车经上高、慈化、长沙至湘潭；濮阳地区南下干部随后梯队从上饶乘火车经南昌至九江，改乘轮船经蕲州、武汉、嘉渔、岳阳、长沙至湘潭，前、后梯队在湘潭汇合，并在此进行了短期的休整。10月20日，西进支队从湘潭出发，徒步向贵州进军。10月21日至26日，中共贵州省委和二野五兵团在邵阳召开会议，对进军贵州和贵州解放后接管的方针政策策略、方法步骤和征粮支前等任务向各地委进行了全面部署，并确定了各地委负责接管的地区，一大队接管贵阳地区。10月29日至11月4日，西进支队一大队由邵阳进驻芷江一带，在此期间，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和全体干部会议，传达中共贵州省委邵阳会议精神，宣布各县党、政、军领导班子组成名单；部署接管后各市、县立即要进行的工作，同时进行入黔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11月6日起，西进支队的干部和勤杂人员，以大队为单位，从芷江分批徒步向贵州进发，入黔后分赴各地区进行建政和接管工作。11月15日贵阳解放后，西进支队一大队于11月24日抵达贵阳，贵阳地委根据省

委的指示，研究决定贵阳地区所属为11个县，修文是贵阳地委、专署和分区机关的驻地。

一中队（濮阳县）夏树屏任修文县委书记，带队接管修文县；调一中队（濮阳县）李冀础任贵阳市云岩区区长，带队接管云岩区（县级）；调一中队（濮阳县）吴近仁任瓮安县长，带队接管瓮安县。一中队（濮阳县）85人（南下76人，从江西吸收的学生9人）于11月23日到达修文，11月24日建立了中共修文县委员会和修文县人民政府。12月11日瓮安县解放。

六中队（尚和、内黄县）11月24日由冯福申带领80余名干部到达开阳县，开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冯福申。11月27日张悦斋带领70余名干部到达开阳县城，中共开阳县委员会宣告成立。

七中队（南乐、昆吾县）11月22日由王涌波带领80余名前梯队干部到达息烽县城，11月23日息烽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阴明村。11月25日，后梯队同志抵达贵阳。孟周奉命带领部分接管平塘县，王志超带领20余人来息烽，11月26日后梯队到达息烽，11月27日中共息烽县委员会成立。12月8日，孟周带领39人（昆吾县为主）到达平塘县，平塘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十中队（清丰、卫河县）11月17日由王陞三带领前梯队19人到达贵筑县花溪镇，11月22日陈达之带领后梯队60余人到达。11月25日成立中共贵筑县委员会、贵筑县人民政府。12月23日，王陞三带领23人及一个排兵力到达长顺县，长顺县人民政府成立。

五、建功立业、丰碑永存

1949年11月始，濮阳地区西进黔干部相继在息烽、修文、开阳、贵筑、平塘、瓮安、长顺等县建政接管，在中共贵阳地委领导下，和各族人民一道在解放晚、时间短、任务艰巨的情况下，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为全省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开展宣传活动。濮阳地区西进干部首先对城乡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抽调干部组织宣传队（组）深入区、乡镇、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贴布告、写标语、召开各种会议，讲形势、讲政策，戳穿敌人的谣言，揭露敌人的罪恶，表明我党的态度。经过一段形势政策宣传之后，情况逐渐好转，社会秩序初步安定下来。二是军事接管。主要是旧职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和轮训，争取国民党武装交枪投降，清理粮食仓库。各县用了很短时间都基本上交接完毕，档案资料大部分都交出，各种物资都进行了登记造册，清点验收。息烽、修文等九个县，争取和瓦解国民党武装人员491名，旧职人员763名。清理粮食仓库，息烽、修文等8个县清出144万斤，贵筑、长顺等4个县清出积谷265万斤。三是粮食征借。为了解放大西南，保证我军和城市的粮食供应，濮阳地区西进干部到达各县之后，就抓紧征借粮食。为了保证征借任务的完成，各县抽调大批干部、干校学员、留职人员、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学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和督促、检查。大部分县都是普遍布置，重点掌握，依靠群众和社会力量完成。1950年全地区征借粮食3365万斤。四是清剿土匪。1950



群众为南下干部送花

年2月中旬开始，由于我军留守兵力较少，土匪以为有机可乘，发展之快，气焰之嚣张，达到了顶点。为此，贵阳地委于3月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匪情，确定对策，使剿匪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到1951年上半年，骚扰在贵阳地区的土匪基本消灭干净。巩固了各级新生的人民政权，公审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匪首、恶霸，提高了人民的阶级觉悟，为完成五大任务和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濮阳地区南下西进支队的全体成员，从冀鲁豫区到赣东北区开辟工作，又过长江、越雪峰山、进苗岭到贵州高原，克服了进军路上的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为实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孕育了闪着光辉的南下精神。那种为了实现崇高革命理想和党的纲领，为了人民解放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值得人们学习，这段革命业绩将永载革命史册，闪耀熠熠光辉！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南乐“武联防”的故事（二）

杜怀恩

敌人夜袭

自从前天晚上，枣科据点的日伪军吃了亏，联系上小刘据点，扬言要血洗杜家村。当晚，日伪军从枣科东边绕过焦村向杜家村进攻，由于外围巡哨麻痹大意，让敌人钻了空子。

深夜，杜世卿、杜玉林二人前去村北查岗，行走到村外流水沟时，杜玉林低声说：“二叔，你看前面，好像有人影在晃动。”他们俯下身察看，发现水沟北边全是敌人。“二叔你赶快

回去报信，我去庙台撞钟。”杜玉林说罢，二人分头行动。

杜世卿跑去集合点向杜林庆汇报情况，杜林庆果断安排：“全体民兵持枪拿手雷往村北出发，杜玉书、杜朝忠、杜世臣，通知妇救会小组带领全村群众向东转移，你们做好掩护。”民兵队长杜世虞集合民兵迅速赶到村北水沟，杜林庆带领几个人顺沟向西北而去。杜世虞告诉民兵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开枪就要稳准狠，狠狠打击敌人。

另一边的杜玉林已爬上庙台，用力敲响了庙钟。这个庙钟是武村和杜村共同供奉的，钟身高约1.5米，直径0.8米，两村约定非特殊大事不能乱撞钟。被惊醒的村民听到钟声纷纷到这里汇集，了解情况。

就在这时，日伪军向民兵开枪射击，发起进攻，枪声响起一片。杜世虞说：“弟兄们，



让敌人再近点，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开枪。”敌人边射击边向前进，杜世虞一看敌人进入攻击范围，大喊一声“打”，民兵利用枪支和手雷组织反击。正在激战中，日伪军背后响起枪声和手雷的爆炸声，敌人受到前后夹击，惊慌失措，节节败退，缩回据点。原来是杜林庆带领几个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敌人的视线，抄了敌人的后路。

这次战斗持续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有3位民兵负伤，1位民兵牺牲，就在这时，突然又听到张庄集西南方响了枪声。（口述：杜世卿、杜玉林）

武联防的缘起

听到张庄集西南方的枪声，民兵队长杜世虞认为又有敌人前来报复，便带领几位民兵去侦查。当他们快走到张庄集南边时，在黑暗中看见有人影在墙根下走动。他们停下观察一会儿，发现不像是敌人，就小声试问：“你是谁？干什么的？”那人一听是自己人，便轻声回答：“我们是杜文举和杜庆安。”杜世虞快走到二人面前询问情况。柴庄炮楼的日伪军避开樊村冲这张庄集西南角而来，张庄集寨墙由于年久失修，残缺不齐有了缺口，敌人钻空子直接进入韩家大院胡同找人，找不着人才鸣枪射击。就在这时，听见一个伪军说：“这个大门就是韩青珠家的。”敌人二次进院子一看，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气急败坏的日本小队长田野打在那个伪军脸上一个耳光说：“你的情报不准。”躲在暗处的韩青珠带领民兵与敌人展

开了周旋，俩村的民兵齐向日伪军射击，一举打伤了三名日伪军，吓得敌人仓皇逃回据点。这次敌人没有抓到韩青珠，反而被我民兵打得焦头烂额。

韩青珠是八路军南进支队的一个排长，还是战斗英雄，因杀敌负伤回家休养。被坏人告密，日伪军企图逮捕韩青珠，结果狼狈逃走。

在韩青珠、杜文举、根江、杜庆安同杜世虞等会面时，韩青珠说道：“感谢杜家村世虞和其他民兵前来支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单根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这次战斗让我深刻体会到团结力量大。如果咱们几个邻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打鬼子，那该多好啊！”杜世虞急忙说道：“我也有这个想法，杜家村十分赞同你这个建议。”其他的在场民兵都说这个建议好。

韩青珠说道：“世虞同志和在场的其他同志，咱们后天就去找邻村负责人，给他们讲合作的道理，看他们同意不。”杜世虞忙说：“我去武家村和闫村，李家村和樊村你去负责吧！”

第二天中午，杜世虞先后到武家村同武克礼、武新同，去闫村和邵郭田、王秀竹等同志协商武装联防，得到大家的认可，他们一致赞同武装联防共同抗击敌人。

而韩青珠、杜文举则来到了樊村，与樊村的党小组民兵队长李九灵和其他人员讲解昨夜杜家村参战的事，说明来意。樊村参会人员发表了不同见解，有的同志觉得樊村有高大的寨墙，墙上还设有防御垛口、坚固的东西大门，像铁桶一般，日军进不来，认为没有必要联合。大家议论纷纷，沉默多时的民兵李九灵说

道：“俺也说几句，虽然咱村比其他村条件好些，这并不是安全条件。但是人单力薄，孤掌难鸣，光凭条件是不行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同志们听后纷纷称是，经过举手表决，同意联合抗日。第三天下午，韩青珠来到李家村与王合福、王芝汉等同志见面，王合福也表示同意。

武装联防的事情一经六村同意，杜世虞、韩青珠他们及时向村地下党报告，由武装干事王瑞民向区委汇报，区长听后拍手赞同。区委研究决定在杜家村召开各村党小组长及民兵队长会议，商谈具体联合事项。

这一天中午，六个村党小组领导及民兵队长陆续汇聚在杜家村东头临街一个农家小院内。梁区长和各村地下党同志，也陆续到达。梁区长表示：“我代表二区区委大力支持你们武装联防共同消灭敌人，你们是咱南乐第一个自发的武装联防，给全县树立了榜样，是冀鲁豫边区一个典型事例。我要向南乐县委、县政府汇报，争取政府早日批准你们的请求，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咱们的行动宗旨是统一指挥、统一调动、统一行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会议上各村一致同意成立“武联防”民兵大队。

当天夜晚，梁区

长和王瑞民趁天黑避开敌人的封锁，向县委书记唐晓声、县长刘镜西、县基干大队副队长文光德汇报情况。各位领导听到这一典型事例，表示要向冀鲁豫军区报告。

县委书记唐晓声、县长刘镜西向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当面汇报，二人批复，要尽快成立武装联防共同消灭日寇，在冀鲁豫边区全面开展推广。武联防成立时军区、军分区要派代表前去祝贺，并派军事人员帮助做好军训工作。

县政府得到军区首长当面批复，返回后立即召开了二区区委会议，传达了军区首长的重要批示，研究成立武装联防的具体事项。（口述：杜世卿 杜林庆）

武联防的诞生

7月初，梁区长立即召开了六个村庄党的领导小组成员、民兵队长、妇救会、儿童团长参加的会议，研究决定7月6日在杜家村召开



联防民兵使用的红缨枪头和马灯

武装联防成立大会。为确保大会顺利召开，要加强保卫工作，加强防御，特别是外围岗哨要有各村民兵副队长带岗、查岗，杜家村、武家村、樊村要看好东西北大门。动员各村男女老少参加大会，会议期间如有其它情况，要服从县大队的统一指挥。

7月5日，梁区长、王瑞民、杜世虞和杜林庆商议，会址选在街南一片广阔的大场内，可容纳几千人。舞台座北朝南，用六辆轱辘大车并在一起，铺上门板，北面用高粱秸织成的笆围挡住，就是一个简易大舞台。舞台前面东西各栽一根长木杆子，在杆子顶端用绳拉起挂条幅。村长安排妇救会仇凤英、郭凤珍、胡三凤组织烧水做饭。杜世虞拿出文房四宝，挥毫写下“热烈庆祝武装联防的成立”“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民必胜！”等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

午夜时刻，中共南乐县委书记唐晓声、县长刘镜西、军区军分区后勤部、河北民军、八路军南进支队派代表前来祝贺，县大队副队长文光德、政委姚培善带队悄悄绕过敌人的封锁，走进了农家院内。区委、各村党小组负责人、民兵队长上前迎接各级领导和县大队全体战士的到来，文光德考虑到大会的安全召开，命二中队队长魏树林同志带领战士巡逻查哨，监视周围各个炮楼敌人的动向，有敌情就地解决。妇救会的同志用杜世虞借的一点小米煮成热腾腾的小米粥，给县大队的战士们送了过来！县大队炊事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付给了现金。

天亮后，县委书记唐晓声写下“热烈庆祝武装联防大会成立”几个大字，悬挂在舞台前的横幅上，又把“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八个大字，贴在舞台北面。此时各村的民兵吃罢早饭，陆续进入会场，站在大会场的东边。儿童团开始在村口站岗。

时间一到，各级领导、军区、军分区、军后勤部、河北民军、八路军南进支队各位代表进入会场，成立大会开始。大会成立“武联防”民兵大队，六个村庄的民兵组织编制为六个中队，各村为一个中队。通过选举，张庄集韩青珠、杜家村杜世虞当选为“武联防”民兵大队正、副大队长，南乐武装科干事王瑞民为“武联防”民兵大队政治指导员。县大队卫生员协助六个村的妇救会工作，加强对联防区的领导。

不久，南乐县政府、党政军和二区区委各级领导相继搬迁到联防区中心村杜家村街中路北一个大胡同办公，主持全县抗日和其它工作（后来时间久了，大家都叫政府胡同，留传至今）。后方医院、军用物资等都在这里。（口述：杜林庆、杜世卿）

武联防的防敌措施

联防区成立后得到了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第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多次派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前来指导，帮助民兵制定了战斗方案，还支持了很多枪支弹药，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民兵队伍，吓得周围敌人闻风丧胆，不敢轻易骚扰民众。杨勇还派人从冀中送来了各种地道剖面

图，供挖地道时做参考。县长刘镜西送来几门大炮（俗称九节狸）和许多枪支弹药。各级首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六个村庄的民兵决心，各村庄积极进行了备战工作。

一、加筑残缺不齐的寨墙，并在寨墙周围顶上筑掩护体，又开挖护村沟，防止敌人重兵袭击，沟深一般约一丈三尺，宽三丈，沟沿上有掩护体，留有步枪、机枪的秘密射击孔。六个村还制定了联防公约。

二、利用土垡堆。在联防区耕地上有数不清的大小、长短、高低、体型不一的土垡堆，它们像一座座小山，在与日伪军作战时是最好的掩护体。打游击战时，是我联区民兵的最好战场，是最有利的条件。县大队副队长文光德同志站在最高处说道，“与日伪军打游击，真是一个好战场，这是先人的功德！”

这些土垡堆高的有二层小楼高，长约二华里，顶宽约100多米，中间是约一米深的沟，可通行四个轱辘拉庄稼的大车，沟两旁约有3米多宽，这在联防区是出了名的大高路，直通枣科地界。张庄集西北坡的大垡堆有二层楼之高，中间挖了一个大洞，洞前边搭凉棚可让乘凉避雨。武家村村北有方地名叫城里，远远望去好像一座城墙环绕四周，民兵在上面设置防



杨勇、曾思玉发给联防区修建地道剖面图

护体，供作战时用。民兵在各个土垡堆上都设置了防护体和射击孔（现在良凡路西保存一条土垡堆长约一里，60岁以上的老人众所周知）。这些土垡堆是祖辈们起盐地，用铁锹和小推车辛辛苦苦、一锹一车、天长日久垒起来的，已有七百年的历史，毁于1980年至1990年。

三、挖地道。参考杨副司令员送来的各种地道剖面图，打街垒做到了敌阻我通，参照冀中地道战的经验，六个村庄根据各村的地理位置来设计方案，从村内挖通村外的地道口，以便情况紧急随时疏散群众、转移民众，民兵从地道中互相支援。地道口的出入口和拐角处都设陷井翻板、射击孔，在大街小巷则打街垒、设障碍，时刻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比如杜家村的地道入口设在村东街南庙宇内，出口设在村东北角自然形成的流水沟，通往武家村、闫

村，另一道入口设在街中心碾房内石盘下，通往村南流水沟与李家村、张庄集相接处。这六个村庄的地道出入口是按照技术人员给设计的方案制定的。六个村庄临街的房屋还打通一些可容单人进出的秘密通道。通过对村的改造，做到“我可步步为营，上下皆通。敌人处处挨打，寸步难行。”

四、根据战争的需要制定了战斗方案、预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部队参谋人员指引下，联防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严格划分了警戒区域、方向，确定了白天、夜晚的各种旗语和灯光信号，一旦有敌情，三五分钟内全联防区人人皆可知晓。

全民参与的抗战、除奸、防特轰轰烈烈展开，集资捐款、青年入伍、支援抗战，为了确保联防区的安全，青壮年、妇女及儿童团轮流盘问过往的行人，防止汉奸特务混入联防区刺探情报。（口述：杜玉坤）

除奸记

武联防的成立震惊了冀鲁豫边区的敌人，像一把锋利尖刀插入了他们的核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利用各种关系打听联防区的情况。

在10月初，大名县伪警察局长的老婆回张庄集走娘家，她终日走东窜西，经常在一些带枪民兵家中出入，引起了注意，及时报告了民兵大队。民兵队长派了几名群众对她进行了秘密监视，发现她企图策反民兵带枪投敌。在掌握确切证据后，将她逮捕扭送公安局，经审

讯后执行枪毙。

在11月下旬，一天早饭后，一位卖绒线的货郎从西边大道上朝杜家村方向走来，手拿货郎鼓，边走边喊“卖绒线，卖绒线哟！货全价廉，全是上等货。”此时，杜家村儿童团长杜玉美在岗，他手持红樱枪，举枪就问：“干什么的？”把那货郎吓了一跳，他回过神来说道：“小兄弟，是卖绒线的，不信你就看看挑子里面的东西。”“有路条吗？”杜玉美问。那货郎赶紧从衣兜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路条让玉美看，这才放他进村。

那货郎边走边喊，眼睛不时地东张西望，走街串巷，和胡氏走了碰头。那货郎急忙上前答话。“老太太您用线吗？”胡氏说俺不用，家有线。货郎又说：“我渴，你给找点水喝。”胡氏从家里端来一碗水，那人一饮而尽，然后又问你家有几口人，都是干什么的？问得胡氏不耐烦了，说道：“水喝足了快走，不然叫民兵把你抓起来。”就在这时，民兵杜玉书迎面走来，看见这个货郎不像是个买卖人，鬼鬼祟祟的，便主动与他答话：“你的货好吧，跟我走，让家人看看你的线。”货郎遂挑起担子在后面跟着来到一个门口，杜玉书喊道：“来人啊。”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把货郎带到民兵大队长面前，经审问，原来是南乐伪县长警备大队李铁册的参谋申XX，他身穿便衣来到联防区刺探情报，被民兵活捉。（口述：杜玉书、杜玉美）

未完待续

朱冠的为官之道

周进鹏

南宋吕本中在所著《官箴》一书中开宗明义：“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告诫为官从政者务须清廉、慎权、勤政。千百年来，“清、慎、勤”一直被奉为为官“第一箴言”。千年古县清丰，忠孝贯城，古风浸润，成就了难以数计的乡贤才俊。明万历时期的朱冠，以“清、慎、勤”作为立身之本、为官之道，虽出仕晚、为官短，但他勤政守廉、允公允能，尤以善治安阳、鞠躬尽瘁的政声宦迹闻于朝野，其道德操守、精神风范至今仍有镜鉴价值、教育意义。

朱冠为官十年，其中任安阳知县六年、礼部祭祀主事三年、吏部文选清吏司主事一年。安阳、濮阳两地刊载朱冠生平事迹的史志资料较多，尤以家乡志书为最。作为勤廉人物，朱冠多次入载濮阳地情丛书。

明洪武年间，朱冠曾祖朱雄从山西迁至直隶大名府清丰南永固集。朱冠生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字元甫，别号佩黼。其父弟兄三人，其父朱宪文行二。其墓志铭载，“赠公（指朱宪文）和而煦物，有诚长者风，以友爱闻于乡。伤时俗之伦也，礼让之不行也。开阁四达之衢，以祠汉昭烈、壮繆、车骑三公（指刘备、关羽、张飞三人），镌文于石以诏里俗，

闻者感动，薄俗为之丕变”。

其叔父朱宪武结婚不久去世，没有留下后代，婶母杨氏刚满19岁。其时，朱冠还未出生。其母张氏与婶母约定：“吾他日有子，以一为叔嗣。”

朱冠出生后，便成为两家共有的儿子。

在良好家风熏陶下，他孝敬父母、尊长知礼。朱冠对待婶母如亲母一样，入仕后，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婶母的起居生计。杨氏终身未嫁，在朱家守寡60余年。朱冠多次向地方官员反映婶母的贞烈节操，期望有所彰表。后当地在清丰县城南街为杨氏立建贞节坊。

朱冠为家中独子，寄托着父辈的厚望。他少时聪颖，学习刻苦，“十岁就外傅，日诵数千言”。朱宪文认为其子可教，“吾求吾子为士人耳，他何问焉”，不吝重金，不惧耻笑，为朱冠“延名师，督之学”，并“为之减割腴



吕本中《官箴》

田至二百亩”。明万历七年（1579），朱冠不负众望，乡试中举。然而命运多舛，朱冠长时间未能进士及第。但他胸有抱负、矢志科举，终在16年后的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荣登乙未科进士榜，列三甲126名，与同乡张养正（后任江西九江知府、朱冠儿女亲家）为同科进士。此时，朱冠年39岁，属于大器晚成。

二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即进士及第第二年，朱冠被授以安阳令，这是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安阳，古称邺，时为彰德府（古称相州）辖县、府治所在地，“为九州孔道，輶轩之使踦切肩摩，赵藩国焉。军民杂处，号为难治”。河南彰德府与直隶大名府毗邻，家乡距安阳近200里。朱冠在此任职，倍感责任重、压力大。

上任伊始，朱冠即访民情、察民苦。他讲究方法、注重效率，“堂上治文书，庭中决讼牒，道旁迎冠盖，阡陌间劝农桑，事事有法”，“忽而走置驿、存过客，忽而飞羽盖、劝农桑，一日而十所需公，则十所得公”，“公独从容酬应”。随从官员感到诧异，把他比作汉代异术大师蓟子训，朱冠却自嘲：“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朱冠不仅勤政有范，而且治水有方。他未雨绸缪，把治水作为民生大计，不顾一些人的反对，极力督促民众凿井灌田。“冠不为辍，得井数千，所灌无算”，安阳“灾而无害”。大中丞（巡抚）钟公来安阳视察灾情，问朱冠：“何所计划，而井井若是？”朱冠对曰：“救荒无奇策，惟有备乃可无患耳。”

凿井灌田大获成功，朱冠又察看山川地貌，

谋划修渠引水。漳河、洹河（安阳河）流经安阳西，曾是战国时期魏国邺令西门豹、唐代相州刺史李景、北宋政治家韩琦治水的地方，然“岁久湮阍，莫有知者”。朱冠“遍访遗迹，得万金渠、珍珠泉二区”，“乃建闸洹河上流，增石堰三，长阔各数十丈，融金液锢之，筑长堤里余，旁通斗门，更广故渠，为四：曰普泽、曰清流、曰凤尾、曰望洹。再分为均利等数十渠，复演为龙爪等数百渠。自是，一郡二百里皆流泉也。珍珠泉出郡西之水冶镇，方不逾亩，四拓之得泉盈顷，中起亭台，环植松竹，蔚为胜地，名之曰广济。更分为支渠数十道，溉田千顷。两工既成，邺民大获其利，欢呼歌舞，有‘星渠百道，泉珠米泥’之谣”。

有人嫉妒朱冠治水之功，以修渠引水影响漕运为名向上举报，朱冠泰然处之、以理服人：“此国与民两利计也，吾官可罢，渠可废乎？”事实证明，“闸启则洹以成渠，闭则障渠以复洹，源从洹出，委与洹合，相为用不相为厉，甚便计也。因推本末，具言之，渠得不废。”

清乾隆《彰德府志》收录有《重开万金支渠碑记》，该碑目前仍立在安阳西部高平村大闸旁的修渠碑林中，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碑文由安阳籍、时任南乐知县（后任大理寺正卿）的吴定受朱冠之邀撰写，翔实记述当年朱冠指挥修渠的场面实况和修渠后带来的水利盛景。其中写到，“公乃损抑贵倨，旦夕慰劳之，稍扶其惰不共（不出力）者，云动雷行，鼓不胜竞，不残民力，不靡圭刀（合理利用民力和时间）。凡数阅月，遂毕工。”这些渠道形成渠网，“纵横屈曲，重支叠港，贯畦浮塍，分象

成文。江南擅水利称泽国，今河北之江南云”，“他田秋禾石计不半（收成不超过半石），而近水三倍过之。斯其水利之明验，可以灼当时而芳千古矣！”如今，万金渠仍在发挥作用，成为安阳农业灌溉、西部工业的主要供水源。

朱冠还号召百姓从长计议，“广储蓄，以备岁荒”，当时“积谷至二十万石，可支十年，储煤炭至数十万石”。他还下令减富民车户，禁止闲散游民赌博滋事。他做事一贯雷厉风行，但“独于刑狱，则再四推鞫”，他认为“此民命也”。“三年中，所活疑狱至七十余人”。朱冠关心民众疾苦，“在安阳设有义田义塾，以赡孤嫠、教子弟，移官过家，再图修举，各有端绪。”

朱冠在安阳任职期间，成绩卓然，获评第一。“戊戌考绩，赠封父母如其官，辛丑年大计吏（考核官员），天官所论有司，卓异二十三人，公为之冠。”

洹河悠悠，民心昭昭。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冠“擢礼部祠祭司主事”，离开安阳到京城任职。百姓得到消息后，“遮道哭送”，极力挽留。挽留不得，安阳百姓于是“为肖像祠于南郭，额之曰‘朱邑侯治水救民处’”，以感恩其政、感念其德。

三

朱冠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到京城后更加勤勉敬业，处事不苟。在礼部任职时，他曾代表朝廷，来河南册封延津王，“所馈仪币及珍玩琴书甚多，一切却之。”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朱冠改任吏部文

选清吏司主事，“所司册库至为繁剧”，官员选拔、考核评比、档案管理任务繁重。朱冠感叹道：“此群吏殿最之府也。”他带领属下，“分夜校阅，散品以下必亲裁焉”。当时工部大行开纳之事，以至有人疏通关系买官入仕，朱冠敢于较真，“公以为滥，悉驳止之。”

在安阳期间，朱冠“自其治邺时，固以勤民，积瘁，至是形骸虽硕，精神已阴耗矣”。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朱冠正在处理人事选拔事宜，“疾陡作，正衣冠而逝，年仅五十。”朱冠死于任上，“缙绅大夫无问识不识，咸痛惜之。”

朱冠为官清廉，宦声晴朗，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在朝野很有影响。“历官十年，所至以清节自持，然口不言贫。卒之日，四壁萧然，无以为殓，人始叹服其廉节云。柩出都门，缙绅送者倾城。比至家，里人哭者罢市。安阳距清丰二百里，士民来吊者肩摩于途。各以名宦乡贤请此，足以观人心矣。”“安阳人来吊者，哭尽哀，曰：‘我父母也。’”

明天启二年（1622），朱冠入乡贤祠。受其影响，其二子朱世炜、朱世灿均成为贡生。清丰旧县志评价朱冠，“为人宽洪有识度，遇事敢为，心胸洞朗，绝无城府。意所投合，即生死不顾。”朱冠去世一周年之际，受其长子请托，兵部尚书、“长垣七尚书”之首的李化龙饱蘸深情，专门为其撰写二千余字的墓志铭，概括并赞誉朱冠的非凡一生。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浅议年鉴资料收集整理的范围、方法与要求 ——以《濮阳年鉴》为例

程瑞敏

在党史方志部门重塑性改革的背景下，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年鉴作为系统记述、合理反映本行政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资料性。资料性是否彰显，是检验年鉴质量高低、价值大小的最重要标准。《濮阳年鉴》严把资料供稿第一道关口，重视入鉴资料的权威性、科学性、全面性，2024 卷将系统记述、

全面反映濮阳市积极推进资源枯竭城市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创造，真正把年鉴打造成年度资料性文献，为切实发挥资政、存史、育人作用奠定基础。

一、年鉴资料收集的范围内容

（一）把握地方年鉴的基本特征

年鉴具有资料性、全面性、系统性、年度性等特点，这是年鉴区别其他出版物的基本特征，年鉴编辑要科学把握年鉴这些根本属性，明确稿件征集的方向和内容。年鉴稿件征集离

不开工作总结，但又不全是工作总结的汇编，也不是各方面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按照统一的体例规范编纂而成。系统记述各行业、各系统、各部门发展情况，要求全面记述，做到纵“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根据事物发展规律，适时调整年鉴框架，全面、系统记录濮阳现代化建设发展具体实践。比如 2022 年 6 月 20 日，济郑高铁濮阳至郑州段开通，濮阳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濮阳



《濮阳年鉴》（2009 ~ 2022 年）

年鉴（2022）》即时增设了济郑高铁濮阳东站的相关内容记述；作为全国首个“米”字形高铁网的最后一撇、全省最后一个通高铁的地级市，全市的重要历史时刻，在题图部分作为重要专题图片重点展现。年鉴编辑还要深入调研，补充、增加、完善资料，以保持数据的连贯性，特别是有关全局的数据、整体的数据、宏观的数据，一定要连续收录，逐年可比，以此反映事物发展的轨迹，侧面反映和证明时代发展变迁的具体实践。

（二）明确资料的选材范围

年鉴要选择有年度特点和史料价值、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新事、特事、要事”。大事，指职责范围内发生的对本部门、本系统有重要影响的事。新事，指事物发展新方向、新阶段、新水平，具有推广借鉴价值的事。特事，指最能代表一地特色的事。要事，指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年度重点话题。“大、新、特、要”，要站位高、选材准，站在一地、全面的高度去审视材料，把一地大事要事选出来、反映出来。比如《濮阳年鉴（2021）》“法院”分目中“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条目提到“审理全省首例由市政府为原告、市长出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为河南首例由市地级人民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在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任市长杨青玖代表濮阳市人民政府出庭参加诉讼，为管辖区内被造成污染的河流“维权”，是当年热点之一、影响较大，随文配相关照片，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年鉴资料按照加工程度的深浅可分为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年鉴选材时，要注意一、二、三次文献的比例和布局，要压缩原始性文件等一次性文献，提升二、三次文献在年鉴中的应用。

一次文献是指没有经过编选者编辑加工的原始性文件资料。所谓“原始性”，在年鉴中是原文照登，编者不刊一词。年鉴在特载、法规文件、附录等篇目都收录了大量一次文献。

二次文献通常是在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压缩、概况、抽象、整理、标识、绘制等）的基础上形成，其基本类型有：文摘、目录和名录、大事记和专项年表、简介、统计表和统计示意图、照片、索引等。二次文献具有信息密集、客观准确、完整独立等特点，要善于运用二次文献，必要时编辑要在一、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绘制表格、目录、摘要记述等形式，把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集中收在一起。

三次文献是年鉴内容的主体，其表现形式是条目。条目是年度客观事实及相关情况、资料的集合体，是条目化年鉴主体内容的基本寻检单元和相对独立的信息主题。条目在很多年鉴中的篇幅达到60%~70%。精心编写条目，充实条目内容并提高其有效信息含量，是强化年鉴资料性，提交年鉴编纂质量的重要保证。

（三）掌握资料的来源形式

一是文字资料。供稿的主要来源，包括文件、简报、汇报、内部资料，占比最多的就是各机关单位的年度总结材料或某项工作、活动

的总结报告，或在传统纸质媒介、新媒体发布的热点新闻报道。

二是图表资料。图片和表格是年鉴资料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相对文字而言，更具直观性、可比性和逻辑性。图片和表格是年鉴的重要内容，是信息资料的补充和扩展。图片专辑不仅反映地方文化，还生动形象地反映上一年度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特事和新事，涵盖全市自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表格因具有简洁、清晰、准确、节省篇幅、逻辑性及对比性强等特点而被精品年鉴广泛采用。

三是链接资料。链接入鉴的情况较少，在南方部分年鉴中可以看到。一般作为补充资料延伸阅读入鉴，通过链接资料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热点事件往往具有标志性、典型性，具有认知标本价值和研究价值。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记载，会大大提高年鉴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能力，提升年鉴的信息价值，增强年鉴的可读性和时代性。

二、年鉴资料收集的路径方法

（一）提升政治站位。新时代年鉴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系统准确记录在党中央领导下砥砺奋进、创造幸福的具体实践，科学总结蕴含其中的宝贵经验，“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为河南乃至全国谱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篇章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年鉴编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要做到“胸中有丘壑、立马振山河”，必须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领会中央、省委重要指示精神，仔细研读全国、省、市“十四五规划”、党代会报告和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了解本区域在全国战略规划、全省实施重大部署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深刻把握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难点，研究地方独有的历史文化，以相关类目、分目、条目彰显地方特色，收集整理地方发展独有的新视点，在年鉴中展现地方年度亮点，为年鉴整体布局框架设计寻找源头依据和理论支撑。

（二）明晰时代特色。《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九条要求：“年鉴框架应体现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年鉴系统记述一个区域的全年各方面发展成果是其史料价值的根本所在，而一个分类科学、与时俱进地体现年度发展重点的大纲框架则能细腻、醒目地反映该区域的年度特色和地域特点。仔细研读精品年鉴，发现其共通之处在于，在框架设计过程中能够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经济等特点出发，抓住地方独特之处，设计出颇有特色的框架。精品年鉴的个性特色主要分年度特色和地方特色两个方面，年度特色的大事、要事、新事等，可以在特载、专文、大事记中予以专门记述；地方特色应体现在年鉴的框架设计中，突出各行政区域因自然环境、气候、人文等因素不同，导致资源、产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自“精品年鉴品读季”以来，濮阳市树立精品意识，在整体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部分类目、分目作较大调整。按照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大建设”进行分块,体现新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为重要参考,以最新行业分工为重要依据,在征稿前制定《〈濮阳年鉴(2023)〉整体框架、供稿单位、编辑分工一览表》,创新“订单式征稿”方式,力争做到横分门类不缺项。

(三)厘清部门职责。自党的十九大安排部署“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以来,供稿单位机构及职能发生明显变化,编纂人员必须紧跟新时代发展步伐,掌握负责部类单位的职能职责和新兴行业发展动态。通过报纸、大事记、网站、公众号及视频号等途径查找各部门最新机构职能,了解各单位上年度发生的大事要事特事要事新事。凭借年鉴专业功底,仔细研究稿件内容,捕捉各行业各部门相关工作并深度追踪,挖掘相关资料,以便对篇目作修改调整,增强年鉴的时代性、常新性。现实工作中,年鉴编辑不可能对所有行业、部门的情况了如指掌,分目、条目的设置还有赖于资料稿的比对、印证,因此,濮阳市在年鉴征稿前分批次召开年鉴编辑、市直机关供稿人和县区编辑培训会,在各单位撰稿前要授之以渔,便于他们从本部门本行业本地的实际出发,选准、写好条目。各编辑与供稿单位保持良性沟通,研究所纂稿件的内容,一方面审视、修改篇目,另一方面比照正确的分目,发现条目缺少或内容欠缺,便于返稿于单位进行补充、修改,挖掘补充新资料,包括照片、图表等,保证资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三、年鉴资料整理的基本要求

古人说:“无征而不信”。如果没有大量资料,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合格的新年鉴;如果没有大量、全面、准确、典型的资料,就很难写成一部高水准的年鉴。在年鉴资料收集后,还需要深思熟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梳理整合、订正,确保年鉴资料可信、可用和可读。坚持“边收集边整理边反馈”的工作机制,及时收稿整理,尽早向已报送资料的单位反馈存在问题,增强年鉴资料的准确性和收集效率,确保高质量完成年鉴资料收集工作。

(一)要保证权威客观。在年鉴资料供稿过程中,供稿人所提供资料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经各单位主管领导审阅后运用。年鉴编辑通过对大量一手资料进行严格筛选,对收集到的所有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比较、鉴别、计算、校正,剔除不真实、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资料,确保资料的真实准确与可信。比如行政区版图、图片专辑、特载、专记、统计资料、附录等,需要向对应的权威部门征集最真实可信、最具权威性的资料。各类目中同一类事物的数字资料有不尽相同的情况,首先要分清这些数字的来源,来历不明的数字最好不要。自同一部门,但前后有矛盾,应该选择最新的数字资料;不同部门数字互相打架的,应当优先选择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统计部门资料。由于地方年鉴所涉及的内容繁多,各行各业都有涉及,编辑不可能对每个方面都能够真正深入进去,但是应

该尽可能的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调查研究，更新自己的知识，掌握识别真伪的本领，要对历史负责，秉笔直书、如实记载、客观公正，不虚构、不夸张、不溢美，更不能妄加评说。

（二）要保证科学合理。对收集到的资料按照既定框架纂写，但条目设置、内容归类要科学合理、逻辑清晰。分类的标准要按中国图书分类法确定的知识体系分类标准，同时参照《国务院公文主题词表》的分类标准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具有共同属性的资料放在一起；在框架设计中还要考虑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及变化情况，但要注意克服按行政机构或产业部门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来分类的习惯做法，应按照事物发展的新形势最情况，打破一个部门对应一个部类或一个分目的刻板模式。主要是依据资料性质和范畴，依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社会分工，确定不同层次标准，然后按大、中、小类依次细分框定归位信息资料。因为年鉴尤其是综合年鉴所涉及的领域多、门类全，一般都设有部类、分目、条目或章节等三级或者四级内容，在对这些众多的内容进行分类时就要坚持科学性原则，使之分类明确科学合理，读者在阅读起来方便实用。条目作为年鉴的主体、密集信息的主要形式，其选题、选材和语言科学与否，也直接影响着年鉴的质量。因此在撰写条目时，应该坚持科学性原则，用准确、简洁的语言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目，达到“望题知意”效果。

（三）要保证完整实用。年鉴体例所规定

的时限以内的材料为主，不要漫无边际地进行收集，但如是关于探本溯源、记述兴衰演变的内容，则可以适当延伸，简明扼要记述。完整即要求叙事完整、要素齐全，不支离破碎，能完整地记述来龙去脉，一般应具备时间、地点、人物（单位）、事件、原因、结果六要素，但也要注意避免叙述一般过程、罗列出席人员、抄录领导人讲话、偏重气氛描绘等做法。图片尽量选取全景式会议、活动照片，图题要简洁明了，完整显示日期、地点、事件、拍摄者等信息。表格设计应反映事物全貌，栏目设置要科学，表题表题用词应简明扼要，尽量避免使用点号。不能过于简单罗列另外，年鉴是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反映出事物发展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向前发展，年与年之间的承接性和延续性是很强的。持续发展进行的事物事件每年都要写，前一年未完结的事，下一年度要继续记，同一部类资料信息不仅记述的事实情况要有连续性、衔接性，用以说明情况的数据指标也要延续不断、纵向可比。年鉴资料各组成部分要有机整合，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记述内容详略得当。针对对年鉴资料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变化，篇目、分目应当做适当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年鉴更好为现实服务的需要。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2024 年 7 ~ 9 月中共濮阳市历史大事记

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7月1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市纪委监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上半年工作汇报，以及近期安全生产、信访工作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2日，市委书记万正峰到所在的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同支部党员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交流党纪学习教育心得体会。

7月3日，省委常委、省军区少将司令员赵钧率军地联合调研组来濮巡河、巡林并组织召开座谈会。

7月6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全市防汛视频调度会议进行安排部署。

7月9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暨“书记·代表公民面对面”座谈会召开，部分人大代表、企业界代表和公民代表作发言，就推动濮阳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7月9日至1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率执法检查组来濮阳市开展黄河保护法执法检查。

7月10日，全市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传达学习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对全市旅游工作作安排部署。

7月15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濮阳市调研产业与人才融合发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工作。

7月16日，全市科技大会召开，传达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及全省科技大会精神，通报全市科技创新工作进展情况，安排部署科技创新有关工作。

7月17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相关工作会议、调研精神，研究濮阳市贯彻落实意见和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18日，全市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召开，总

结脱贫攻坚工作，推动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7月23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濮阳市贯彻落实意见。

7月2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7月26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2024年第二季度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暨“三个一批”项目观摩点评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作具体工作部署。

7月26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全市防范“格美”台风工作调度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作工作部署。

7月28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省有关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防汛救灾、经济运行、重点民生实事、政府系统纪律建设等工作。

7月2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总结党纪学习教育情况，谈参加党纪学习教育体会，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努力方向。

8月2日，市政协九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暨“开诚商量”专题议政会召开，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精神，并围绕“着力打造豫东北职业教育高地”进行专题协商议政。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8月8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省有关

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群众诉求”办理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市城区排涝能力提高、污染防治等工作，集体学习《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8月15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重点民生实事推进会议。市城市管理局、市科技局、华龙区政府、濮阳投资集团、濮阳城发投集团负责人对牵头的民生实事推进情况进行汇报。

8月16日，濮阳市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进会议召开，对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作进一步安排部署。

8月19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相关工作会议、调研精神，研究濮阳市贯彻落实意见和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月20日，中共濮阳市党外人士座谈会召开，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8月21日，中国共产党濮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总结濮阳市上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会听取和讨论万正峰同志讲话，审议通过《中共濮阳市关于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濮阳实践的实施意见》，表决通过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有关事项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濮阳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

8月22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纵深推进濮阳市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再审视，再加压，再深化。

8月23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濮阳市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振利作宣讲报告，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

8月27日，省委巡视持续整改工作推进会暨未巡先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对省委第二轮巡视持续整改、第五轮巡视未巡先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8月27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听取八届市委第七轮巡察综合情况汇报，省委、市委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专项巡视巡察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八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工作建议，对全市巡察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8月27日，2024年上半年离退休干部市情通报会召开，对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平安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统战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工作等情况进行通报。

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市长·代表公民面对面”座谈会召开。市长朱良才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景良主持。4家市直单位负责人汇报全市养老服务工作情况。3位人大代表、3位公民代表、4位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围绕发展养老事业、完善养老体系作发言、提出意见建议。

8月28日，濮阳市2024年“慈善一日捐”暨“99公益日”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对2024年“慈善一日捐”“99公益日”“中华慈善日”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8月30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省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全省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工作现场会精神，并研究濮阳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月30日，市委书记、濮阳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议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听取濮阳军分区及驻濮部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9月3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省有关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经济运行、“群众诉求”办理等工作。

9月9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纪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听取濮阳市党纪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就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行部署。

9月9日，中秋国庆“双节”廉政恳谈会

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出席并讲话。

9月9日,市安委会召开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和下一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9月10日,全市庆祝第40个教师节座谈会召开,宣读市委、市政府《致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通报全市教育工作情况。部分校长和教师代表发言。

9月1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4年第12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濮阳落地落实。

9月18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纪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9月1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相关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全市贯彻落实意见和相关工作。

9月23日,全市数字化转型推进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省数字化转型推进会议精神,通报全市数字化转型推进情况,对全市数字化转型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9月24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4年第13次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选人用人和干部人事编制工作、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河南省市县党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等文件精神 and 民族宗教工作有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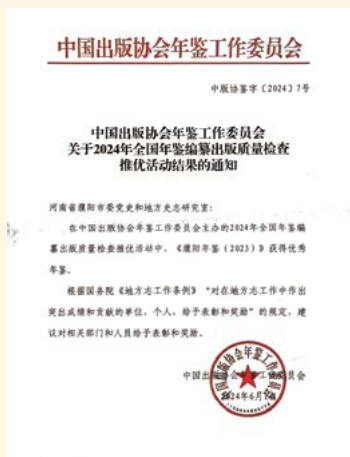
9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和干部人事编制工作、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数字化转型推进会议、全省教育大会、全省未来产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关于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并研究濮阳市贯彻落实意见。

9月24日,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会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会见部分参会人员和公安功模代表并讲话。

9月25日,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濮阳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和污染防治等工作。

9月26日,全省“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会在濮阳召开,进一步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到会致辞。

9月26日,全省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治理现场会在濮阳召开。副省长孙运锋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出席会议并致辞。



《濮阳年鉴（2023）》获评全国“优秀年鉴”。



7月8日，《龙都濮阳·充满希望》系列丛书编纂工作启动。



7月10日，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到国家方志馆南水北调分馆学习考察。



7月30日，党史文献片《渡河》《身负大任的段君毅》创作启动仪式先后在台前、范县举行。



7月31日至8月2日，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赴济南、北京调访，推进影像志工程。



9月12-14日，山西、山东、河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室）来濮阳调研。



9月19日，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开展纪念革命烈士主题党日活动。

濮阳市“五佳内资”出版物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